

# 武威汉墓之旒

## ——墓葬幡物的名称、特征与沿革

马 怡

内容提要：本文对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所出的幡物进行了研究。这些幡物题有文字，长幅，覆盖于棺柩，学者们多认为此即文献记载中的“铭旌”。本文认为，从这些墓葬幡物的源流、时代和形制看，其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旒”。本文并以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对墓葬幡物的颜色、长度、安放位置和文字等进行考察，以期揭示其特征及演化发展的进程。

关键词：东汉 武威磨嘴子汉墓 幡物 旒 铭旌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了多件题有文字并覆盖于棺柩的长幅幡物。这些幡物被称作“幢幡”、“铭旌”、“柩铭”，其发掘整理情况，见刊于《文物参考资料》、《考古》的报告和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武威汉简》一书。<sup>①</sup>多年来，有若干学者先后注意过它们，对其文字、图画等进行解读。<sup>②</sup>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在探讨汉墓帛画时涉及的，角度与深度各有不同，而专论很少。尤其是，对这些幡物的确切名称、特征、作用以及演变等，都还有进一步思考的

① 见党国栋《武威县磨嘴子古墓清理记要》，《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11 期，该文称之为“幢幡”；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 年第 9 期，该文称之为“铭旌”，这也是学界最通行的叫法；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年，第 148—149 页，图版贰叁，摹本二五、二六，该书称之为“柩铭”。“磨嘴子”或写作“磨咀子”，本文统一作“磨嘴子”。

② 相关的书籍，如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之《柩铭考释（附镇墓券）》，第 148—149 页；刘晓路《中国帛画》第 3 章《帛画学诸问题》，北京，中国书店，1994 年，第 41—58 页；陈隍《古代帛画》第 3 章《帛画的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第 50—84 页。其中，《武威汉简》一书所作释文与考证颇为精到，常为研究者征引。相关的文章，如安志敏《长沙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考古》1973 年第 1 期；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考古》1973 年第 2 期；刘夫德《铭旌的图像与文字》，《文博》2008 年第 4 期；李零《中国古代的墓主画像——考古艺术史笔记》，《中国历史文物》2009 年第 2 期等。其中，马雍先生的《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尽管其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本文有启发的意义。谨此向马雍先生致敬。

余地。为此,笔者试从辨识、考察这些幡物的实物与文字入手,结合传世文献,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据目前所知资料,这批幡物可考的有5件。<sup>①</sup>它们出自甘肃武威磨嘴子墓葬群的4号墓、15号墓、22号墓、23号墓和54号墓,年代约当东汉前期至中期。墓葬群位于河西四郡之一的武威郡之姑臧县,东汉时为郡治所在地。据发掘报告称,该墓葬群皆土洞墓,就随葬品看,“不属于上层统治阶级,而只能是普通官吏和地主阶级”。<sup>②</sup>按此,该墓葬群之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或可大致比拟为先秦的士。在本文中,笔者将以此墓葬年代和等级作为征引礼制和研究讨论的基础。这5件幡物如图:



图1



图2



图3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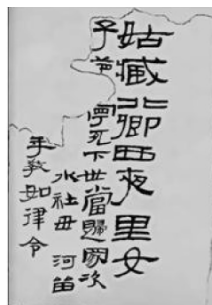


图5

① 除本文所考5件外,1956年在磨嘴子1号汉墓曾出土“丝织残幡片”,“浅红色,上有墨迹,字迹不清,其中一片较大,残长90、宽50厘米,置于棺盖上”。见党国栋《武威县磨嘴子古墓清理记要》,第70页。另据报导,1972年在磨嘴子49号汉墓曾出土“铭旌”,但具体情况不明。见陈隍《古代帛画》,第68页。又,1930年在河北怀安东汉五鹿充墓曾出土“铭旌”,“惜一经手触悉化灰尘”。见马衡《汉代五鹿充墓出土刺绣残片》,《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第10页。另承张德芳先生告知,甘肃高台县亦曾出土过类似的幡物,其中一件为红色,上有粉笔隶书“元康元年十二月庚戌朔晋故凉州表是(下残)”。“元康”,西晋惠帝年号,“元康元年”为公元291年。该幡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2011年8月,笔者在访问高台县博物馆时,曾见到当地出土的另外四件(据说总共有六七件)汉晋墓葬幡物,其质地为红色或褐色丝帛,上有墨迹或粉笔的题字。惜字迹残损,可辨识者甚少。其中一件稍完,题作“☐金昌☐令☐ (?) ☐ ☐ 荆之神枢☐”。

②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第15、26页。

其释文是：<sup>①</sup>

[图1] 姑臧渠門里張□□之区<sup>②</sup>

[图2] 姑臧西鄉閼導里壺子梁之□[枢]<sup>③</sup>

[图3] 姑臧東鄉利居里壺□[某某之枢]<sup>④</sup>

[图4] (第1行) 平陵敬事里張□

(第2行) 伯升之枢過所毋留□<sup>⑤</sup>

[图5] (第1行) 姑臧北鄉西夜里女

(第2行) 子……寧死下世，當歸塚次

(第3行) ……水社，毋河(苛)留

(第4行) ……[有天]帝教，如律令<sup>⑥</sup>

现将这5件幡物的出土情况、年代、颜色、质地、尺寸、书体、文字等归纳列表，以便讨论。

① 对这5件幡物的释文，笔者另有《武威汉墓幡物释考》一文详考，待刊。

② 参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第148页，摹本二五。“之区”原为合文。这是一件深赭色丝织品，长220厘米、宽37厘米。墨书一行，每字约15厘米见方。

③ 参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第149页，图版貳叁。这是一件紫红色丝麻织品，长206厘米、宽45厘米，下端残毁。《武威县磨嘴子古墓清理纪要》一文称此物为“幢幡”，“丝织，紫红色……置于四号墓棺顶上”，“最上端两角画为圆券，券内隐约看出似为动物形，下部接续画虎，再下全为云纹”。党国栋《武威县磨嘴子古墓清理纪要》，第70页。

④ “壺”，原释作“出”（见安志敏《长沙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陈锺《古代帛画》等）或“土(?)”（见李零《中国古代的墓主画像——考古艺术史笔记》），今据图版改。笔者于2009年10月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秦汉——罗马文明展》上曾目验该幡物之实物。这是一件红色丝织品，长220厘米、宽37厘米，上端有黑色（或深褐色）的宽缘，下端残缺。墨书一行，其上方左侧画月，内有蟾蜍；其上方右侧画日，内有九尾狐和乌。并参中国国家文物局、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秦汉——罗马文明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

⑤ “留”，原释作“哭”（见《武威汉简》一书，刘夫德《铭旌的图像与文字》、李零《中国古代的墓主画像——考古艺术史笔记》），或“留”（安志敏《长沙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后一说似是，见马怡《武威汉墓幡物释考》一文，待刊。笔者在《秦汉——罗马文明展》上曾目验该幡物之实物。这是一幅颜色微红而近淡褐的丝织品，质地细薄，下端残损，长115、宽38厘米，周缘有赭色镶边。墨书两行，其上方左右各有一径约15厘米的圆形，左为日，内画乌；右为月，内画蟾蜍。出土时，其顶端有“一平常树枝为轴”。并参《武威汉简》，第148页；安志敏《长沙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第50页；中国国家文物局、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秦汉——罗马文明展》，第319页。

⑥ “毋河留”，应即“毋苛留”，见马怡《武威汉墓幡物释考》一文，待刊。这是一件深赭色丝织品，长59厘米、宽45厘米，左上角残泐，朱书四行。见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第149页。该书认为“此非铭旌，属于所谓镇墓券者”。今按：从该物在墓中的放置情况和其颜色、文字等看，它与前几件幡物亦有相近之处，似乎居于一种中间或过渡的形态。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幡物简况表

编号	出土情况	年 代	颜 色	质 地	尺 寸 (厘米)	书 体	文 字	备 注
图 1	磨嘴子 22 号墓，覆于棺盖	东汉前期至中期	深赭色	丝织	220 × 37	墨书篆体	县、里、姓、字 + “之柩”	顶部有担杆 (?) ①
图 2	磨嘴子 4 号墓，覆于棺盖	东汉初期至中期	紫红色	丝麻织	206 × 45 下端残	墨书篆体	县、乡、里、姓、字 + “之柩”	在墨书的上端两旁画圆券、虎、云纹
图 3	磨嘴子 54 号墓，详情未见报导	约当东汉中期	红色	丝织	220 × 37 下端残	墨书篆体	县、乡、里、姓、字 + “之柩”	在墨书的上端两旁画日、月等
图 4	磨嘴子 23 号墓，覆于棺盖	东汉前期至中期	微红近淡褐色	丝织	115 × 38 下端残	墨书篆体	县、里、姓、字 + “之柩过所毋留”	在墨书的上端两旁画日、月等，其顶部有担杆
图 5	磨嘴子 15 号墓，覆于棺盖	东汉前期至中期	深褐色	丝织	59 × 45 已腐烂	朱书隶体	县、乡、里、女子、姓、字 + “死下世，当归冢次……水社，毋苛留，……有天帝教，如律令”	墓主人为女性

上表显示，这五件幡物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都铺放在棺盖上。其颜色以红色为主，另外的几种颜色——赭色、褐色，亦近于红色，或系由红色褪变所致。其质地大多为丝织，亦用麻织。其形长方，往往“长于棺的长度而稍窄于棺”。<sup>②</sup>其字迹为墨书、篆体，偶见朱书、隶体。其文字内容为死者的本籍、姓、字和“之柩”等，上端两旁或描绘日、月。

一 说铭

这几件武威汉墓所出的幡物，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们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铭旌”。有人还将先秦礼书里的“铭”与之对应，认为“铭旌”即“铭”，后者是前者

①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一文之附图（《考古》1960年第9期图版柒之7）显示，这件幡物的顶部似有一细横杆或绳。但该文未说明此幡物是否有杆。

②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第25页。

的简称。<sup>①</sup>这一看法并不准确。

首先应指出,“铭”的出现要早于“铭旌”,“铭”与“铭旌”并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今将先秦礼书中有关“铭”的记载择要引录于此:

铭,明旌也。[郑玄注 “神明之旌。”]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  
[郑玄注 “不可别,形貌不见。”]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其道焉耳。  
(《礼记·檀弓下》)<sup>②</sup>

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缙长半幅,赆末长终幅,广三寸。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郑玄注 “铭,明旌也。杂帛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为不可别,故以其旗帜识之。爱之,斯录之矣。亡,无也。无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终幅二尺。在棺为柩。今文铭皆为名,末为旆也。”]竹杠,长三尺。置于宇西,阶上。(《仪礼·士丧礼》)<sup>③</sup>

设熬置铭。[郑玄注 “铭,今书或作名。郑司农云:铭,书死者名于旌,今谓之柩。”贾公彦疏 “‘铭,今书或作名’者,非古书出见。今《周礼》或作‘名’,以其铭书死者名,亦得通一义,故司农以‘名’解之。司农云‘铭,书死者名于旌,今谓之柩’者,铭所以表柩,故汉时谓‘铭’为‘柩’。《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者,谓为铭旌用生时旌旗,但洁而小。案《士丧礼》注,王则大常,诸侯则建旗,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云‘亡则以缙,长半幅’者,亡,无也。为生时无旌旗,子男之士不命是也。生时无旌旗,故用缙长半幅,长一尺。云‘赆末长终幅,广三寸’者,依《尔雅》,一入赤汁谓之赆,再入谓之赆。赆,赤色缙也。长终幅,长二尺。云‘书名于末’者,书死者名于赆末之上。云‘曰某氏某之柩’者,某氏是姓,下某是名。此谓士礼。案《丧服小记》云‘周天子、诸侯、大夫书铭并与士同。’”](《周礼·春官宗伯·小祝》)<sup>④</sup>

祝取铭置于重……祝取铭置于殯……取铭置于重……祝取铭置于茵。(《礼记·士丧礼》、《既夕礼》)<sup>⑤</sup>

① 例如,马雍说“《仪礼》、《礼记》上多称铭旌为‘铭’……‘铭’则系‘铭旌’之简称。”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第199—220页;李零说“‘铭旌’见于《周礼·春官·司常》,礼书也简称‘铭’。”李零《中国古代的墓主画像——考古艺术史笔记》,第17页。

② 《礼记正义》卷九《檀弓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301页,第1307页校勘记。

③ 《仪礼注疏》卷三五《士丧礼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130页,第1132页校勘记。

④ 《周礼注疏》卷二五《春官宗伯·小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812页。按“赆”,同“赆”。

⑤ 《仪礼注疏》卷三六《士丧礼第十二》,第1135页;卷三七《士丧礼第十二》,第1140页;卷三八《既夕礼》,第1147页,第1149页。

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朴，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墻翬之飾，表以旌銘之儀。（《後漢書·趙咨傳》）<sup>①</sup>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顏師古注 “以此職追贈。”〕（《漢書·薛宣傳》）<sup>②</sup>

柩之言也，具書其謚，置棺旁，萬世久藏也。（《記統》）<sup>③</sup>

據以上記載可知，在古代喪禮中，人們要為死者作“銘”。其作法是：在一定尺寸和顏色的織物上，書寫“某氏某之柩”，用竹杠懸起，以為“神明之旌”。因死者已入棺柩，不見容貌，不可識別，故作此標誌死者之“神明”的旗幟，用以“表柩”。《說文》金部“銘，記也。”因“銘”上書寫死者名，用以“表柩”，故亦可稱之為“名”、“柩”。而“銘”是此物較早的正式的名稱。

從先秦到漢代，罕有使用“銘旌”一詞的例子。偶爾出現，似乎也不是正式的名稱。如《周禮·春官宗伯·司常》曰：“大喪，共（供）銘旌，建廡車之旌。”<sup>④</sup>在這裡，“銘”之旌很可能是由於同其他的旌（廡車之旌）並提而被稱作“銘旌”。又《周禮·春官宗伯·巾車》曰：“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鄭玄注 “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廡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sup>⑤</sup>賈公彥疏“云‘所執者銘旌’者，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sup>⑥</sup>鄭玄稱巾車之官執“銘旌”，似乎也是為了將“銘”之旌同其他的旌相區別。再如，上引《後漢書·趙咨傳》“表以旌銘之儀”，則是“旌”、“銘”並提。至於賈公彥、孔穎達等解說經書時所謂“銘旌”，當是後世的叫法。<sup>⑦</sup>

就目前所知史料，大約在漢末以後，禮制中才見正式使用“銘旌”這一名稱。如《晉書·宗室·安平獻王孚傳》：“魏明悼後崩，議書銘旌。”<sup>⑧</sup>《魏書·禮志二》：“今銘旌紀柩，設重凭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于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sup>⑨</sup>《南齊書·禮志》：“（宋大明二年）仆射王儉議‘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旌，復置何處？’”<sup>⑩</sup>當“銘旌”成為正式的名稱時，

① 《後漢書》卷三九《趙咨傳》，第1314頁。

② 《漢書》卷八三《薛宣傳》，第3390頁。

③ 《太平御覽》卷五五〇《禮儀部二九·柩》引《記統》，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6年，第2489頁。

④ 《周禮注疏》卷二五《春官宗伯·司常》，第827頁。

⑤ 《周禮注疏》卷二七《春官宗伯·巾車》，第825頁。

⑥ 例如上引《周禮·春官宗伯·小祝》賈公彥疏“銘旌用生時旌旗，但沽而小”；《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楊徵者，公徒也”，孔穎達疏“此生之徽識，如死之銘旌”。

⑦ 《晉書》卷三七《宗室傳·安平獻王孚》，第1083頁。

⑧ 《魏書》卷一〇八之二《禮志二》，第2771頁。

⑨ 《南齊書》卷一〇《志第二·禮下》，第158頁。

可以与“铭”通用。如《通典·礼·沿革·凶礼·丧制之二》“设铭”条“《大唐元陵仪注》：大敛讫……又设铭旌。”<sup>①</sup>则唐时之“设铭”又称为“设铭旌”。又《清稗类钞·丧祭类》“丧用之铭旌”条“铭旌，丧具也，亦谓之铭，又谓之明旌。”<sup>②</sup>则清时之“铭旌”亦可称为“铭”。但应注意，当“铭”、“铭旌”两名称通用时，“铭”的形制或已与前不同（详下）。

还应指出，“铭”的形制需要辨析。上引《仪礼·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又《周礼·春官宗伯·司常》曰：“杂帛为物。”<sup>③</sup>则士之“物”为杂色帛。其形制，据上引《仪礼·士丧礼》，为“缙长半幅，经末长终幅，广三寸”。《说文》糸部“缙，帛黑色。”《说文》赤部“经，赤色也。”糸部释“縗”：“帛赤黄色。一染谓之縗，再染谓之经，三染谓之纁。”“经”为红色，亦指红色帛。则铭的顶端为黑色帛，悬垂的部分为红色帛，文字写在悬垂的部分。“铭”的主色为红色，此与武威汉墓所出幡物略同。又据《仪礼·士丧礼》郑玄注，“终幅”为二尺。贾公彦疏：“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郑君计侯与深衣，皆除边幅一寸，此亦两边除二寸而言之。”<sup>④</sup>兹以汉尺度之：1汉尺约合23.1厘米，则半幅为23.1厘米，终幅为46.2厘米。按此，“铭”的总长度为半幅+终幅=3汉尺，即23.1+46.2=69.3厘米；宽度为3汉寸，即6.93厘米，当呈条带状。将该尺寸与武威汉墓所出幡物和下文将要讨论的文献所记“旌”的尺寸对照，可见有明显差异。

“铭”最初可能与“徽识”同制。“徽识”来源于九旗。九旗，周代以不同徽号表示不同等级和用途的九种旗帜。<sup>⑤</sup>《礼记·明堂位》：“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sup>⑥</sup>《礼记·檀弓上》：“周人尚赤。”<sup>⑦</sup>周人尚赤，故用赤旗。《周礼·春官宗伯·司常》：“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郑玄注“凡九旗之帛皆用绛。”]<sup>⑧</sup>《说文》糸部“绛，大赤也。”是周之“九旗”皆红色。又曰“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郑玄注“事、名、号者，徽识所以题别众臣……三者旌旗之细也。《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缙长半

① 《通典》卷八四《礼四十四·沿革四十四·凶礼六·丧制之二·设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75页。

② 徐珂《清稗类钞·丧祭类·丧用之铭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册，第3543页。

③ 《周礼注疏》卷二七《春官宗伯·司常》，第826页。

④ 《仪礼注疏》卷三五《士丧礼第十二》，第1130页。另据简牍资料记载，汉代丝帛的幅宽确为二尺二寸。如江陵张家山简《算数书》：“缙幅广廿二寸，袤十寸，贾廿三钱。”《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439：“任城国亢父缙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

⑤ 《周礼注疏》卷二七《春官宗伯·司常》：“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旗，通帛为旛，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旄，析羽为旌。”第826页。

⑥ 《礼记正义》卷三一《明堂位》，第1490页。

⑦ 《礼记正义》卷六《檀弓上》，第1276页。

⑧ 《周礼注疏》卷二七《春官宗伯·司常》，第826页。

幅，赆末长终幅，广三寸，书名于末’，此盖其制也……今大阅礼，象而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当以相别也。”]①是“事、名、号”等“徽识”为“旌旗之细”，而“铭”与此类“徽识”的形制一致。

“徽”即“微”。《墨子·旗帜》：“城上吏卒置之背。”孙诒让《閒诂》：“此置背等并谓吏卒所著小微识。”②《说文》巾部“微，帜也，以绛微帛，箸于背。”《广雅·释器》：“幘、微、幘、幘、帛、帜，幡也。”王念孙《疏证》：“张衡《东京赋》‘戊（戎）士介而扬挥’，薛综注云‘挥，为肩上绛帜如燕尾者也。’微、微、祔、挥并通。”③是覆于人背的“微帛”亦红色。又《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杨徽者，公徒也。”[孔颖达疏“徽识制如旌旗，书其所任之官与姓名于上，被之于背，以备其死，知是谁之尸也。《士丧礼》云‘为铭各以其物……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今之铭旌旗幡也。此生之徽识，如死之铭旌。其制之大小，盖亦如铭旌也。”]④孔颖达亦指出，死者的“铭旌”（按：孔氏所谓“铭旌”即“铭”）与生者背上的“徽识”作用略似，大小相同。

倘若早期的“铭”确实与先秦之“徽识”同制，那么其尺寸就不会很大。上引《仪礼·士丧礼》说“铭”用竹杠撑起“竹杠，长三尺。置于宇西，阶上。”则“杠”的长度为“三尺”。此亦可从旁证明，“铭”的长度不会超过三尺。或正因其尺寸不大，在较早的典籍中，未见以“铭”或“铭旌”覆盖棺柩的明确记载。⑤

## 二 说旌

据文献记载，在古代丧礼中，士有二旌。也就是说，除了“铭”之旌外，还有一旌：

祝取铭置于茵。[贾公彦疏：释曰“初死为铭，置于重……铭亦入圻之物，故置于茵也……士无廌旌，唯有乘车所建摄盛之旌，并此铭旌而已。”]（《仪礼·既夕礼》⑥）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郑玄注“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华。志谓

① 《周礼注疏》卷二七《春官宗伯·司常》，第826页。

② [清]孙诒让《墨子閒诂》卷一五《旗帜》，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83—584页。

③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七下《释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④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〇，昭公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098页。

⑤ 唯《礼记·檀弓上》孔疏说“铭旌”（指“铭”）入圻、《仪礼·既夕礼》贾疏说“铭”入圻（详下），而孔、贾皆唐人。又《钦定仪礼义疏》卷三〇《士丧礼下·第十三之二》：“司马氏光曰‘铭旌去杠，覆于柩上。’案：此亦司马氏以意为之，非古制然也。铭旌入圻与否，经无文。”《四库全书》经部，礼类，仪礼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年，第107册，第136页。今按：司马光所谓“铭旌覆于柩上”是宋代制度。

⑥ 《仪礼注疏》卷三八《既夕礼》，第1149—1150页。



章识。”]饰棺墙，置罍，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旒，夏也。[郑玄注“绸练，以练绸旒之杠。此旒，葬乘车所建也。”孔颖达疏“案《既夕》，士礼而有二旒。一是铭旒，是初死书名于上……葬则在柩车之前，至圻与茵同入于圻也。二是乘车之旒，则《既夕礼》乘车载旒，亦在柩之前，至圻。柩既入圻，乃敛乘车所载之旒，载于柩车而还……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之二旒也……士以礼无遣车，故无廌车之旒，但二旒耳。”](《礼记·檀弓上》)<sup>①</sup>

按此，士在丧礼中有“铭”之旒（按：即贾公彦、孔颖达疏谓“铭旒”）和“乘车之旒”，共二旒，而无“廌旒”（装表明器和祭品的“廌车”之旒）。送葬时，二旒皆在柩前。此“乘车之旒”，《仪礼·既夕礼》贾公彦疏认为是“旒”；《礼记·檀弓上》孔颖达疏认为是“旒”，不入圻，但未交代其说所据。“旒”通“旒”。《释名·释兵》：“通帛为旒……通以赤色为之，无文采。”<sup>②</sup>“旒”是无文采的红色旗，士丧礼中使用为“摄盛”，即超越车服常制，以表贵盛。而据此条《礼记·檀弓上》郑玄注，“葬乘车所建”之旒当为“旒”。从葬制的发展看，它很可能是“旒”，或是“旒”与“旒”（旒）的结合。

旒的历史亦早于铭旒。上引《礼记·檀弓上》说丧仪用旒是夏礼，可知旒的渊源极为久远。由于史料匮乏，曾有人怀疑夏代的存在，其时是否有文字、是否有织物，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过，就文化发展的规律来说，一般为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倘若旒的历史确实古老，则其初始时很可能是以图像来表示死者的“神明”。<sup>③</sup>据文献记载，旒上有图画。《说文》旒部“旒，龟蛇四游，以象营室，游游而长。”朱骏声《通训定声》：“旒，旗画龟蛇者，四游象室壁四星。”<sup>④</sup>据《穆天子传》记载，盛姬死，送葬时“曾祝先丧，[郭璞注“导也。”]大匠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郭璞注“言旗上画日月及北斗星也。”]<sup>⑤</sup>疑此前导之旗即旒。

汉代有旒。《后汉书·志·礼仪·大丧》记载“旗之制，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旒曰‘天子之柩’。”<sup>⑥</sup>是汉天子之旒“画日、月、升龙”。出土实物中亦有证据。例如，马王堆一号、三号西汉墓所出之T形帛画，其顶端有横杆，底地为红色，亦绘有日、月、升龙以及星辰、龟蛇、墓主人形象等。这两件帛画都覆在棺盖上，前者长205厘米、顶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后者长235厘

① 《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第1284页。

② [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七《释兵》，第351页。

③ 马雍指出：夏代未必有文字，即使有亦很简单，而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图画作为表达工具，“倘使夏代果然已有铭旒，则原始的铭旒必然以图像来表示标识死者神明的意义”。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第122页。

④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3页。

⑤ 《穆天子传》卷六，《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第300页。

⑥ 《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大丧》，第3144—3145页。

米、顶宽142厘米、下部宽50厘米。<sup>①</sup>对于此类帛画的名称,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非衣”,有人认为是“画荒”,也有人认为是“魂幡”、“铭旌”。<sup>②</sup>后一说近是。而从此类帛画的年代、颜色、形制和安放位置等来看,其更准确的名称似应是旌。<sup>③</sup>

武威东汉墓所出的几件幡物也应是旌。旌的一般形制,据《尔雅·释天》记载:“缙广充幅,长寻,曰旌。”[郭璞注“帛全幅长八尺。”]<sup>④</sup>是旌的宽度为整幅,长度为一寻。一寻为八尺,<sup>⑤</sup>以汉1尺合23.1厘米计算,则旌的长度为184.8厘米,宽度为46.2厘米。可知旌是较大的旌幡,长幅悬垂。中国古代的文字历来是从上到下书写,旌的这种形制颇便于题写直行大字。将《尔雅·释天》所记旌的尺寸与武威汉墓之旌对照,可见二者间虽有差距,但并不甚远。而武威汉墓之旌的题字体形颇大,正是直行书就的。

《尔雅·释天》说旌的质地是“缙”,缙是黑色帛。而用于丧葬的旌却是红色的,称为“丹旌”。梁简文帝《太子舍人萧特墓志铭》:“丹旌轻飞。哀歌徐引。”北周王褒《送观宁侯葬诗》:“丹旌书空位,素帟设虚樽。”<sup>⑥</sup>武威汉墓之旌的颜色,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T形旌的底色,也都是红色的,它们应当就是“丹旌”。又王褒《送观宁侯葬诗》曰“丹旌书空位”,则“丹旌”上可书写标志死者的文字,这同武威汉墓之旌也是一致的。

武威汉墓之旌中,有的有图画,有的无图画。有图画的,如磨嘴子4号墓、54

①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39页,图版七一;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彩版二〇。

② 主张“非衣”者,如《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关于帛画·唐兰、俞伟超”条、“关于遣册·史树青”条,《文物》1972年第9期;商志耀《马王堆一号汉墓“非衣”试释》,《文物》1972年第9期。主张“画荒”者,如陈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若干问题考述》,《文物》1972年第9期。主张“魂幡”者,如孙作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幅考释》,《考古》1973年第1期;刘敦愿《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若干神话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6期。主张“铭旌”者,如《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关于帛画·顾铁符”条;安志敏《长沙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第51页;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第124—125页等。

③ 马雍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是“铭旌”,并说“铭旌的名称很多,或谓之‘铭’,或谓之‘明旌’,或谓之‘旌’,或谓之‘丹旌’,或谓之‘枢’”。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第119页。这种将铭与旌、铭与铭旌、旌与铭旌全部混一的说法有未安之处。另,在山东临沂的多座西汉墓葬中发现过覆于棺盖的帛画(如金雀山九号汉墓所出帛画,长200厘米、宽42厘米,绘有日、月、双龙等),亦有可能是旌。相关报导见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金雀山考古发掘队《临沂1997年发现的四座西汉墓》,《文物》1998年第12期;陈直,《古代帛画》,第62—65页等。

④ 《尔雅注疏》卷六《释天》,十三经注疏本,第2610页。

⑤ 《说文》寸部释“寻”:“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

⑥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四《人部·哀伤》,卷四九《职官部·太子舍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91页,第598页。

号墓、23号墓所出的旒（见本文图2、图3、图4）。在它们的上端，均绘有代表日、月的圆圈，圆圈内有乌和蟾蜍等动物之形；在日、月之下，或接画虎和云气。《释名·释兵》：“日月为常。谓画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sup>①</sup>“常”是天子所建之旗，其顶端画日月。然而上述几件武威汉墓之旒和马王堆汉墓T形旒都表明，此种日、月图乃是汉代墓葬幡物的常见之图，非天子独用。<sup>②</sup>也有的武威汉墓之旒无图画。这似乎表明，此类幡物之有无图画，在东汉时已没有定规。西晋贺循《葬仪》曰：“杠，今之旒也。古者以缁布为之。命（今）以绋缁，题姓、字而已，不为画飭也。”<sup>③</sup>可知古时的旒曾用“缁布”，西晋时则为“绋缁”，且“不为画飭”。<sup>④</sup>大约最迟自西晋起，此物已通常无图画。无图画的旒，如果不计较其尺寸大小，就与铭很像了。或有可能已与铭合而为一。

有旒的旒，又称“旒旒”。“旒”是旌旗垂缀的饰物。《诗经·商颂·长发》：“为下国缀旒。”郑玄笺“旒，旌旗之垂者也。”<sup>⑤</sup>西晋潘岳《寡妇赋》：“飞旒翩以启路。”李善注“《尔雅》曰‘广幅曰旒。’凶幡，即今之旒旒。”<sup>⑥</sup>《世说新语·排调》：“白布缠棺竖旒旒。”<sup>⑦</sup>这些都是“旒旒”用于丧礼的证据。又《颜氏家训·终制》：“吾当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随，床上唯施七星板……粮罍明器，故不得营，碑志旒旒，弥在言外。”卢文弨曰：“旒旒，古之明旒也，旒则旒之垂者。”<sup>⑧</sup>按前文引《礼记·檀弓下》曰“铭，明旒也”，故“古之明旒”即铭。则此时铭、旒或已结合为“旒旒”。

旒在送葬时启引棺柩，下葬时随棺柩入圹。上引潘岳《寡妇赋》：“飞旒翩以启路。”[李善注“旒，丧柩之旒也。”吕延济注“旒，引柩幡也。”]<sup>⑨</sup>《晋书·颜含传》：“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家人迎丧，旒每绕树而不可解，引丧者颠仆。”<sup>⑩</sup>是旒为引棺柩之旒幡，在棺柩前“启路”。又，《太平御览·礼仪部》：“《礼论》曰：问

① [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七《释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第351页。

② 参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第121页。

③ 《太平御览》卷五五二《礼仪部三一·旒》，第2499页。

④ 马雍认为，“从贺循的说法中，反映出晋代尚有‘为画饰’之例，而贺氏之意，似乎以为古代之旒不为画饰”。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第121页。疑其理解有误。

⑤ 《毛诗正义》卷二〇《商颂·长发》，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626页。

⑥ 《文选》卷一六《赋辛·哀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38页。

⑦ [南朝]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第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20—821页。

⑧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七《终制第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36页。

⑨ [西晋]潘岳《寡妇赋》，《六臣注文选》卷一六《赋·哀伤》，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4页。

⑩ 《晋书》卷八八《孝友传·颜含》，第2285页。

下殇葬墓有旛否?徐邈答曰:旛以题柩耳,无不有旛。”<sup>①</sup>徐邈,东晋人,载《晋书·儒林列传》。十一至八岁死为“下殇”,<sup>②</sup>其墓中亦有旛,是旛随棺柩入圹。《南史·循吏传·孙谦》:“今使棺足周身,圹足容柩,旛书爵里,无曰不然。”<sup>③</sup>由“旛书爵里”,知旛上书写死者的爵称、本籍。则“旛以题柩”,葬墓“无不有旛”,乃是常制。<sup>④</sup>

南北朝时期,大约是受战争和动荡局势的影响,礼制较为混乱。旛与铭旛的变迁就是一例。宋崔元凯《丧仪》曰:“铭旛,今之旛也。天子丈二尺,皆施附树于圹中。”<sup>⑤</sup>崔氏称当时的“旛”即从前的“铭旛”。而前文曾引《南齐书·礼志》记载:宋大明二年(458),太子妃薨,有司问用几旛。仆射王俭曰:“……凶部别有铭旛,若复立旛,复置何处?”此处的“旛”,应是一种用于凶事的有旛的幡。则其时“铭旛”曾与此“旛”共存。王俭认为既然有“铭旛”,便不应再立此“旛”,其建议被采纳。未知此“旛”与旛旛有否关联。又《隋书·志·礼仪三》:“北齐制,旛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达于庶人,唯旛而已。”<sup>⑥</sup>此处的“旛”有“旒”,亦用于凶事。《汉书·五行志下之下》:“君若缀旒,不得举手。”注引应劭曰:“旒,旛旗之流,随风动摇也。”<sup>⑦</sup>则北齐的“旛”与此有“旒”之“旛”共存。对于礼制的这种混乱情况,隋初牛弘有一段议论: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sup>⑧</sup>

隋、唐两代都对葬制有所改革。《通典》在记述凶礼时,只有关于“铭(铭旛)”的条目,而没有关于“旛”的条目。唐代的旛只是旛旗之一,嘉礼、军礼、凶礼等皆用。旛在葬制中原有的功能已经消失。

综上所述,“铭”、“旛”大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铭”可能与“徽”同源。“徽”

① 《太平御览》卷五五二《礼仪部三一·旛》,第2499页。

② 《仪礼注疏》卷三一《丧服》:“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第1111页。

③ 《南史》卷七〇《循吏传·孙谦》,第1717页。

④ 马雍认为,“铭旛”(按:其所谓“铭旛”即“铭”)入圹,而“乘车之旛”不入圹。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第119页。疑其说未安。

⑤ 《通典》卷七九《礼三十九·沿革三十九·凶礼一》,第2144页。

⑥ 《隋书》卷八《志·礼仪三》,第155页。

⑦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第1490页。

⑧ 《隋书》卷八《志·礼仪三》,第156页。

即“徽识”，为“旌旗之细”，红色，条带状，上有事、名、号，著于人背。有死事时，可据以识别尸身。人已死，就为之制作“铭”。“铭”与“徽”相似，以红为主色，形制不大，有题字，用竹杠悬起，为“神明之旌”。“旌”是古老的旗帜，大概在文字出现之前已有。丧用的“旌”形制较大，以红为底，绘有图画，为表枢、引枢之幡，入圻。东汉时，此物不仅有图画，并题写“县、里、某姓字之枢”等文字。后渐无图画，或与“铭”合而为一。再到后世，此类墓葬幡物的名称逐渐固定为“铭旌”。<sup>①</sup>

附带说一下，清代有丧用之“丹旌”。《清史稿·志·礼·凶礼·品官丧礼》：“讣日发引……仪从前导，引以丹旌、铭旌。满用丹旌，汉用铭旌。”<sup>②</sup>清福格《听雨丛谈》“丹旌”条“八旗有丧之家，于门外建设丹旌，长及寻丈，贵者用织金朱锦为之，下者亦用朱缙朱帛为之，饰以纁锦。”<sup>③</sup>此“丹旌”与铭旌的作用略同，亦红色，而形制较大，不书文字。有意思的是，清代制度规定，这种似有古风的“丹旌”为八旗满人所专用。

### 三 颜色、长度及安放位置

关于铭、旌、铭旌等幡物的颜色、长度及其在墓葬中的安放位置等，前文已有所论及。本节对它们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排比，以考察其发展变化。

这些墓葬幡物都是红色的，无论是铭、旌，还是铭旌。相关的文献记载，如前引《仪礼·士丧礼》曰“(士之铭)以纁长半幅，经末长终幅”，“纁”为红色；西晋贺循《葬仪》曰“杠，今之旌也，古者以缙布为之，命(今)以绛缙”，“绛”为红色；梁简文帝《太子舍人萧特墓志铭》曰“丹旌轻飞，哀歌徐引”，北周王褒《送观宁侯葬诗》曰“丹旌书空位，素帐设虚樽”，“丹”亦红色。又《通典·礼·开元礼纂类·凶礼》曰“为铭以绛。”<sup>④</sup>又宋司马光《书仪·丧仪》曰“铭旌以绛帛为之。”<sup>⑤</sup>又元方回《续古今考》曰“今人以红帛粉书‘某官某人之枢’，上下绘板，俗曰旌旌。”<sup>⑥</sup>又《明史·志·礼·士庶人丧礼》曰“铭旌用红绢五尺。”<sup>⑦</sup>又《钦定

① 马雍认为，先秦时“铭旌”已别称为“旌”，汉以后“铭旌”之名一度不习用，“旌”则成为通称。见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第120页。疑此说不够准确。

② 《清史稿》卷九三《志·礼·凶礼·品官丧礼》，第2724页。

③ [清]福格《听雨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3页。

④ 《通典》卷一三八《礼九十八·开元礼纂类三十三·凶礼五》，第3512页。

⑤ [宋]司马光《书仪》卷五“铭旌”条，《四库全书》经部四，礼类六，杂礼书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年，第142册，第487页。

⑥ [元]方回《续古今考》卷三，《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年，第853册，第150页。

⑦ 《明史》卷六〇《志·礼·凶礼·士庶人丧礼》，第1492页。

大清通礼·凶礼》曰：“以绛帛为铭旌。”<sup>①</sup>相关的考古资料，如马王堆一号、三号墓之T形旌，武威汉墓之旌等都是“丹旌”。时至今日，民间葬俗中仍然有此类幡物用红色的例子。<sup>②</sup>

墓葬幡物用红色的原因，或与古人的“尚色”观念有关。一方面，如前述，周人尚赤，“铭”可能与“徽”同制，源于周之“九旗”，“旌”则可能是与“旗”、“旛”的结合，故皆为红色。但《尔雅》曰“缙广充幅，长寻，曰旌”，贺循《葬仪》亦曰“杠，今之旌也，古者以缙布为之”，可知旌曾用“缙”，曾为黑色。《尔雅》一书，大约成于战国至西汉初；西晋人贺循所谓“古者”，其上限并不清楚，而从墓葬所出实物（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所出的红色旌）来看，其下限当不迟于西汉前期。《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旌旌节旗皆上黑。”<sup>③</sup>秦人尚黑，旗帜皆为黑色，这或许是旌曾用“缙”的原因。又《汉书·高帝纪》赞“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sup>④</sup>汉初尚赤，旗帜又改用红色。大约从此以后，该制度就一直传承下来。

另一方面，红色又是仙幡的颜色。在青、白、赤、黑、黄“五色”中，红色最为鲜明。“旌”有启路的功能，似与“升仙”有一定的联系。司马相如《大人赋》：“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轻举而远游。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sup>⑤</sup>“垂绛幡之素蜺”，“建格泽之长竿”，可知“大人”的升天之幡为绛色，大幅悬垂，有长竿，与“旌”颇为接近。在汉晋墓葬壁画里，可见到一些“接引升仙”的图像，如陕西靖边杨桥畔东汉墓壁画的“云车升仙”图、“乘鹤升仙”图，德兴里古坟壁画的仙人、玉女持幡图等。<sup>⑥</sup>在这些画面中，仙幡的颜色都是红色的，或是以红笔勾画的。以上所说，只是初步的试探。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何为其主要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墓葬幡物的长度也值得注意。据“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幡物简况表”，这几件武威汉墓之旌的长度是：图1和图3（残长）为220厘米，约合9.5汉尺；图2（残长）为206厘米，约合8.9汉尺；图4为115厘米，约合5汉尺；图5为59厘米，约合

① 《钦定大清通礼》卷五〇《凶礼》，《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年，第655册，第500页。

② 见陈锺《古代帛画》，第180页。

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页。

④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82页。

⑤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56页。

⑥ 陕西靖边杨桥畔东汉墓壁画的“云车升仙”图、“乘鹤升仙”图，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第105页；德兴里古坟壁画的仙人、玉女图，见（日）平山郁夫《高句丽壁画古坟》，东京，共同通信社，2005年，第113页。按：德兴里古坟位于今朝鲜境内，其墓主人为亡命高句丽的后燕幽州刺史。

2.6 汉尺。除了图 4、图 5（图 5 的性质或与告地券、镇墓券相似，该墓之墓主人为女子）外，其他几件旌的长度都远远超过依据《仪礼·士丧礼》所记而推算的铭的长度 3 汉尺，而与《尔雅·释天》及郭璞注所记旌的长度 8 汉尺较为接近。另据前述，马王堆一号汉墓 T 形旌的长度是 205 厘米，约合 8.9 汉尺；马王堆三号汉墓 T 形旌的长度是 235 厘米，约合 10.2 汉尺。因这两者系出自西汉诸侯亲属墓葬，<sup>①</sup>墓主人的身份与其他例子不同，等级较高，旌又作 T 形，故当有所区别。以上都是汉墓所出实物的长度。

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丧葬用旌或铭旌之长度的记载。南北朝以后的资料较为完整。如，《隋书·礼仪志》：“（北齐之旌）三品已上及开国子、男，其长至轸；四品、五品至轮；六品至于九品，至较；勋品达于庶人，不过七尺。”<sup>②</sup>《通典·礼·沿革·凶礼·丧制之二》：“（唐代之铭旌）三品以上长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sup>③</sup>《宋史·礼·诸臣丧葬等仪》：“（宋代之铭旌）三品已上长九尺，五品已上八尺，六品已上七尺。”<sup>④</sup>《钦定续通典》《礼·丧制上·凶》：“明制丧之制，四品以上，铭旌绋帛长九尺。”<sup>⑤</sup>明章潢《图书编·丧礼叙》：“立铭旌：以绋帛为之。六品以下七尺，士庶五尺或三尺。”<sup>⑥</sup>《钦定大清通礼·凶礼》：“铭旌，三品以上长九尺，五品以上八尺，七品以上七尺。”<sup>⑦</sup>清吴荣光《吾学录初编·丧礼门四·庶士丧》：“（铭旌）八品七尺，九品及有顶戴者五尺。”同书《丧礼门二·品官丧》：“庶人之丧，不用铭旌。”<sup>⑧</sup>总括来说，身份越高，所用长度就越大：历代官员最长用九尺，最短用七尺；士庶北齐时不过七尺，明时五尺或三尺；清时九品及有顶戴者五尺，庶人不用。

不同的朝代，尺的大小不同。北齐、唐 1 尺为 30 厘米，宋 1 尺为 31.7 厘米，明 1 尺为 32 厘米（营造尺）或 34.05 厘米（裁衣尺），清 1 尺为 32 厘米（营造尺）或 35.5 厘米（裁衣尺）。<sup>⑨</sup> 7 尺（中低级官员所用旌或铭旌的长度），北齐、唐时约合 210 厘米，宋时约合 222 厘米，明时约合 224 或 238 厘米，清时约合 224 或 249 厘米。这些数字表明，自宋代以后，随着尺的逐渐变大，铭旌亦略有加长，然而铭旌之

① 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的墓主人分别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轅侯利仓的妻、子。

② 《隋书》卷八《礼仪志三》，第 155 页。

③ 《通典》卷八四《礼四十四·沿革四十四·凶礼六·丧制之二·设铭》，第 2275 页。

④ 《宋史》卷一二四《志第七十七·礼二十七·凶礼三·诸臣丧葬等仪》，第 2909 页。

⑤ [清] 乾隆官修《续通典》卷七七《礼·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600 页。

⑥ [明] 章潢撰《图书编》卷一一〇《丧礼叙》，《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 年，第 972 册，第 344 页。

⑦ 《钦定大清通礼》卷五〇《凶礼》，《四库全书》，第 655 册，第 500 页。

⑧ [清] 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一八《丧礼门四·庶士丧》，卷一六《丧礼门二·品官丧》，《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0 年，第 815 册，第 195 页，第 170 页。

⑨ 见丘光明《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97 页，第 112 页，第 123 页，第 147 页，第 153 页。

“七尺”始终是用以覆盖整具棺盖的长度。武威汉墓之旒的长度虽然不是汉尺七尺，但其5例中有3例（图1、图2、图3）的实际长度与后世之“七尺”大致相当。明5尺、3尺（该时期“土庶”之铭旌的长度）约合160或170厘米、96或102厘米，清5尺（该时期“九品及有顶戴者”之铭旌的长度）约合160或178厘米。显然，“五尺”、“三尺”的铭旌都仅够勉强覆盖或不够覆盖整具棺盖。

据先秦礼书，覆盖棺柩之物有夷衾、荒和褚。先看夷衾。《仪礼·士丧礼》：“幪用夷衾。”[郑玄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礼记·丧服大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质杀之，裁犹冒也。”<sup>①</sup>则夷衾覆尸，如韬尸之“冒”，此与铭、旌等幡物有较大差别。再看荒。《礼记·丧服大记》：“（大夫）画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土布帷，布荒。”《通典》：“饰棺者，以华道路及圻中，不欲众恶其亲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土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sup>②</sup>荒是棺罩，其颜色、纹饰、功用亦与铭、旌等幡物不相类。再看褚。《礼记·丧服大记》：“（大夫）素锦褚。”郑玄注“大夫以上有褚，以衬覆棺，乃加帷荒于其上。”《礼记·檀弓上》：“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郑玄注：“以丹布幕为褚，葬覆棺。”孔颖达疏“褚幕丹质者，褚谓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则无褚。今公明仪尊敬其师，故特为褚，不得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质之布而为之也。”]<sup>③</sup>“丹质”，朱红色的底子。在一般情况下，士是没有褚的，但可破例使用。《荀子·礼论篇》亦曰：“无褚丝黻缕鬋，其类以象菲帷幄尉也。”杨倞注“无读为幪……夷衾是也。褚与褚同。”<sup>④</sup>“褚”通“褚”。《广雅·释器》：“褚，幡也。”王念孙《疏证》：“褚之言题署也。《广韵》：‘褚，标记物之处也。’”<sup>⑤</sup>可知“褚”是幡，似幕，可为红色，可有题识，此与武威汉墓之旒似约略相近。但文献中有关“褚”、“褚”的记载甚少，汉代亦未见使用这一名称，故难以进一步考索。

年代属西汉的马王堆一号汉墓、三号汉墓T形旒出土时，皆平铺在内棺盖板上。其顶端俱在北，与棺向一致，惟前者的画面向下，后者画面向上。<sup>⑥</sup>年代属东汉的武威汉墓之旒出土时，亦皆覆于棺盖，发掘报告未详记其具体放置情况。如前述，《太平御览·礼仪部》载《礼论》曰“问下殇葬墓有旒否？徐邈答曰：旒以题柩耳，无

① 《仪礼注疏》卷三六《士丧礼第十二》，第1136页；《礼记正义》卷四五《丧服大记》，第1580页。

② 《礼记正义》卷四五《丧服大记》，第1584页；《通典》卷八六《礼四十六·沿革四十六·凶礼八》，第2323页。

③ 《礼记正义》卷四五《丧服大记》，第1584页；卷七《檀弓上》，第1284页。

④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三《礼论篇第十九》，《诸子集成》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5—246页。

⑤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七下《释器》，第236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39页；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103页。



不有旌”，《南史·循吏传·孙谦》曰“圻足容柩，旌书爵里”，可知旌在南北朝时期入圻。但文献未记其具体位置。依据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 T 形旌和武威汉墓之旌的情况推测，南北朝时期的旌可能亦覆于棺盖。

有关“铭旌”入圻的明确记载，是在唐以后才大量出现的。如《通典·开元礼纂类·凶礼》：“入墓……遂下柩于圻户内席上，北首，覆以夷衾。”“掩圻……施铭旌、志石于圻门之内，置设讫，掩户。”<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开元礼》此处没有提到旌；《开元礼》说棺柩覆以夷衾，这与上引《仪礼·士丧礼》“幘用夷衾”一致。《开元礼》说铭旌在圻门之内，但未记其具体位置。

宋司马光《书仪》曰：“既窆，掌事者置上服、铭旌于柩上。”<sup>②</sup>《书仪》此处已明言铭旌放置“柩上”。南宋朱熹《家礼·丧礼》亦曰：“乃窆：大凡下柩，最须详审，用力不可误有倾坠动摇……已下，再整柩衣铭旌，令平正。”<sup>③</sup>此礼延续到明清。《明会典·礼部·丧礼四·庶人丧礼》：“执事者先布席于圻内，柩至，脱载置席上，北首。执事者取铭旌，去杠，置其上。”<sup>④</sup>《钦定大清通礼·凶礼》：“（官员丧礼）柩车至圻前，役人脱载，去帏盖、方床，下于藉席。祝取铭旌，去杠，纵加柩上……遂窆，丧主辍哭临视。执事者整铭旌，藏志石，设明器，掩圻覆土。”同书“士丧礼”条所记与此略同。<sup>⑤</sup>

## 四 文字

这几件武威汉墓之旌的题字的格式基本一致，皆写作“县名，里名，墓主人姓、字+‘之柩’”等。有的在县名、里名之间加乡名。有乡名的，墓主人或居于乡间；无乡名的，墓主人或居于城内。特别要指出的是，题字中对墓主人的称谓都是其姓、字，而非姓、名。如前述，图 1 的释文为“姑臧渠門里張□□之区”，图版显示，在

① 《通典》卷一三九《礼九十九·开元礼纂类三十四·凶礼六》，第 3534 页，第 3544 页。

② [宋]司马光《书仪》卷八“下棺”条，《四库全书》，第 142 册，第 509 页。

③ [宋]朱熹《家礼》卷四《丧礼》，《四库全书》经部，礼类，杂礼书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 年，第 142 册，第 561 页。

④ 《明会典》卷九三《礼部·丧礼四·庶人丧礼·明集礼》，《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 年，第 617 册，第 869 页。又[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三三《祠祭司职掌·品官丧礼》：“掌事者设席于圻内，遂下柩于圻内席上，北首，覆以夷衾……丧主拜，稽顙，施铭旌、志石于圻内。乃掩圻，复土。”见《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 年，第 597 册，第 611 页。则明代品官以夷衾覆棺柩，将铭旌放置圻内。但未记安放铭旌的具体位置。

⑤ 《钦定大清通礼》卷五〇《凶礼》，《四库全书》，第 655 册，第 507 页，第 512 页。亦见[清]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一七《丧礼门三·品官丧》、卷一八《丧礼门四·庶士丧》，《续修四库全书》，第 815 册，第 185—186 页。同书卷一八《丧礼门四·庶士丧》记载亦略同，见第 197 页。

“張”与“之枢”间有两个字的空白，而东汉人之名多用一个字，字多用两个字<sup>①</sup>，故“張□□”当为死者的姓、字。图2的释文为“姑臧西鄉閭導里壺子梁之□[枢]”，汉代男子常用“子某”为字，故“壺子梁”当为死者的姓、字。图4的释文为“平陵敬事里張伯升之枢過所毋留”，汉代男子常用“伯、仲、叔、季”+“某”为字，以表示兄弟的长幼次第，如光武帝长兄刘縯即字伯升。故“張伯升”亦当为死者的姓、字。图3、图5因残损较甚或笔迹缺失较多，不论。

在汉代墓葬题记中，书写墓主人姓、字的例子也不少，如：

郁平大守冯君孺子，始建国天凤五年。

西河大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

西河大守圖阳榆里田文成万年室，延平元年十月十七日葬。

青州从事北海高密孙仲隐，故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长，年卅，以熹平三年七月十二日被病卒。其四年二月廿一日戊午葬于此。<sup>②</sup>

先秦礼书中的有关记载却与此有别。如前文所引《仪礼·士丧礼》：“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枢’。”郑司农曰：“铭，书死者名于旌，今谓之枢。”贾公彦进一步解释：“‘曰某氏某之枢’者，某氏是姓，下某是名。”又《礼记·丧服小记》：

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郑玄注“此谓殷礼也。殷质，不重名，复则臣得名君。周之礼，天子崩，复曰‘皋天子复’；诸侯薨，复曰‘皋某甫复’。其余及书铭则同。”孔颖达疏“书铭，谓书亡人名字于旌旗也。天子书铭于大常，诸侯以下则各书于旌旗也。‘达于士，其辞一也’者，谓士与天子同也。‘男子称名’者，此并殷礼。殷质，不重名，故复及铭皆书称名也。”]<sup>③</sup>

又《通典·礼·沿革·凶礼·丧制之二·设铭》：

魏皇后崩，缪袭议铭旌曰：“自殷以前，复与铭旌皆书姓，男名女字，无书国者。周之复，天王称天子，诸侯称某甫。某甫，且字。”<sup>④</sup>

缪袭，三国时期魏人。郑玄、缪袭、孔颖达等都指出，礼书所说“男子称名”乃是殷礼，而非周礼。殷人质而不文，不重名，故用名来称呼。

周人则尚礼而重名。《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郑玄注“名者质，所受于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sup>⑤</sup>《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五

① 关于汉代人名、字的研究，可参看马怡《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南都学坛》2010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② [日]西林昭一、陈松长《新中国出土书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第160页，第166页，第186页。

③ 《礼记正义》卷三三《丧服小记》，第1499页。

④ 《通典》卷八四《礼四十四·沿革四十四·凶礼六·丧制之二·设铭》，第2273页。

⑤ 《仪礼注疏》卷三《士冠礼》，第958页。

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sup>①</sup>自周代起，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一般皆有名、有字。在交往中，人自称其名，父、君等尊长呼之亦称其名，他人呼之则称其字（或其行辈、称号），以示敬，这是通常的礼仪。<sup>②</sup>武威汉墓之旌的题字正与此礼仪相合。

墓葬幡物之称姓不称为后世所承袭。如前文所引西晋贺循《葬仪》：“（旌）题姓、字而已。”又《大唐元陵仪注》：“（铭旌）皆书‘某官封姓君之柩’。”<sup>③</sup>又《宋史·礼·诸臣丧葬等仪》：“（铭旌）皆书‘某官封姓之柩’。”<sup>④</sup>又宋司马光《书仪》：“（铭旌）书曰‘某官某公之柩’……官卑曰‘某君’，某妻曰‘某封邑某氏’。皆无官封，即随其生时所称。”<sup>⑤</sup>又明章潢《图书编》：“（铭旌）粉笔大书‘某官某公某号之柩’，妣则书‘某封某母某氏孺人或宜人安人之柩’，无官则书‘处士某号某母某氏之柩’。”<sup>⑥</sup>又《钦定大清通礼·凶礼》：“（铭旌）题曰‘某官某公〔注：内丧书某封某氏〕之柩’。”<sup>⑦</sup>可知各朝代墓葬幡物的题写皆如此，这一传统历两千余年不变。

还应注意，这些题字及所用称谓系题者之辞，出自他人口吻。正因此故，后世有“借衔”的风习，丧家往往要请有名望、地位的人来为死者题写铭旌。清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品官丧》记载：

以绛帛为铭旌，题曰“某官某公〔注：内丧书“某封某氏”〕之柩”……品官借衔题写，用另纸书题者姓名粘于旌。下葬时去其名纸。题曰“某官某公”、“某封某氏”，系题者之辞。<sup>⑧</sup>

类似的记载，亦见《清稗类钞·丧祭类》“丧用之铭旌”条：

铭旌，丧具也……近代用绛帛粉书，叙其官爵，曰皇清诰授某某大夫或某某将军原任某官之灵柩。题者必为当世著人，曰姻愚弟或姻侍生某某某谨题……葬时，去杠及题者姓名，以旌加于柩上。<sup>⑨</sup>

武威汉墓之旌的题字中还出现了“过所毋留”、“毋苛留”（见图4、图5）之类

① 《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第1286页。

② 关于汉代人际交往中所用称谓的礼仪，可参看马怡《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一文。

③ 《通典》卷八四《礼四十四·沿革四十四·凶礼六·丧制之二·设铭》，第2275页。

④ 《宋史》卷一二四，第2909页。但应注意，《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校正·丧葬令》曰“（铭旌）皆书‘某官封姓名之柩’”（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3页），与《宋史》和历代记载不同。疑《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丧葬令》此处有误。

⑤ [宋]司马光《书仪》卷五《丧仪一》，《四库全书》，第142册，第487页。[宋]朱熹《家礼·丧礼》（《四库全书》，第142册，第549页）所载略同。

⑥ [明]章潢《图书编》卷一〇《丧礼叙》，《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9年，第972册，第344页。

⑦ 《钦定大清通礼》卷五〇，《四库全书》，第655册，第500页。

⑧ [清]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一六《丧礼门二·品官丧》，《续修四库全书》，第815册，第170页。

⑨ 徐珂《清稗类钞》，第3543页。

用于通行凭证的词语。在居延汉简中可以见到这样的通行凭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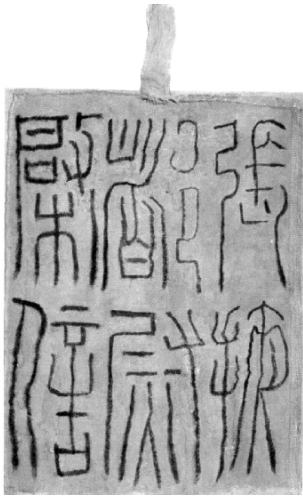
建平五年十二月辛卯朔庚寅，东乡啬夫护敢言之：嘉平□□□□案忠等，毋官狱征事，谒移过所县邑、门亭、河津关，毋苛留，敢言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495.12，506.20A）

奉葆姑臧西比夜里，河津、金关毋苛留。（《居延汉简释文合校》97.9）

居延仓长禹移肩□：出毋留，如律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04.5）<sup>①</sup>

由此，联系到武威汉墓之旄等墓葬幡物的源流、颜色、形制和使用方式等，知其功能恐不止于表枢和送葬启路。在古人的想法里，它或许还是通行于冥界的死者的凭信。

武威汉墓之旄的文字字体也值得研究。除图5外，这些幡物上的文字都以篆体书写，笔划富于装饰性，似乎略显怪异。以非摹本的图2、3、4为例。图2的字多“长脚”，有研究者认为其中“乡”、“尊”、“子”、“梁”等字的笔划含有鸟书的意味。<sup>②</sup>图3的字结构方正，但笔划多微作屈曲。图4的字形体稍纵，亦有微作屈曲的笔划。它们与常见的汉篆略有差异，而与“张掖都尉桀信”的字体有相像之处。“张掖都尉桀信”，1973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长21、宽16厘米，为一长方形红色丝帛，上缘有缀襻，使用时当竖垂悬起。其正面墨书六字，篆体，结构方正，笔划亦微作屈曲。如图：<sup>③</sup>



“信”，符信。扬雄《法言》：“信，符也。”<sup>④</sup>《说文》言部“信，诚也。从人从言。”《广韵·震韵》：“信，验也。”<sup>⑤</sup>“桀”通“祭”。因“桀信”可用帛制，故亦

①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昭《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 刘夫德《铭旌的图像与文字》，第19页。

③ 李学勤《谈“张掖都尉桀信”》，《文物》1978年第1期，图版壹。

④ [汉]扬雄《法言》卷二《修身篇》，《汉魏丛书》，第506页。

⑤ 《宋本广韵》卷四《去声·震第二十一》，北京，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第372页。

写作从“系”的“綦”。<sup>①</sup>《说文》糸部“綦，擻繒也。一曰微帜，信也。”则“綦”亦“微帜”，亦“信”。疑“擻”即“致”，“擻繒”即用丝织物制作的“致”。“致”是一种凭证。睡虎地秦简《田律》：“稟大田而毋（无）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稟之。”整理小组注“致，《曲礼》：‘献田宅者操书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犹券也。’”<sup>②</sup>又《说文》手部“擻，刺也。”《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引《世语》：“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sup>③</sup>“信”、“綦”、“微帜”和“致”、“刺”等，都有标示身份或作为凭证的性质。

“桀信”是幡形的符信，即“幡信”，可用来传令和启闭关门。<sup>④</sup>“幡信”又称“信幡”。晋崔豹《古今注》曰：“信幡，古之徽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为信幡……信幡用鸟书，取其飞腾轻疾也。”<sup>⑤</sup>何为鸟书？《说文·叙》：“自尔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徐锴曰：“案《汉书》注，虫书即鸟书，以书幡信。”]又曰：“（王莽时）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段玉裁注“上文四曰虫书，此曰鸟虫书，谓其或象鸟，或象虫，鸟亦称羽虫也。”]是汉代用特定的字体来书写“幡信”，该字体称为“虫书”或“鸟虫书”。

但是，“张掖都尉桀信”的墨迹似乎与今所见战国青铜器上的鸟虫书存在差异。有的研究者认为，鸟书、虫书有别；何为虫书，至今尚无定论。“张掖都尉桀信”上的字体似乎故作蜿蜒，不知其是否专门用来书写幡信的“虫书”。<sup>⑥</sup>有的研究者认为，“张掖都尉桀信”之书风复古，回环颀长，类似“秦篆”。<sup>⑦</sup>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张掖都尉桀信”是比较规矩的篆书，或可视为篆书题写的“署书”体，武威汉墓所出幡物的墨迹亦如此。<sup>⑧</sup>

“鸟书”、“虫书”、秦篆、署书等都是源头古老的字体。“张掖都尉桀信”和武威汉墓之旄的字体名称或尚可商讨。不过，我们看到，这些同书于红色幡物上的墨迹彼此相近。它们不仅颇具古意，或兼有防伪的功能，同时也显示出了不寻常的郑重和礼敬。

2010年4月初稿，2011年8月修订

① 李学勤《谈“张掖都尉桀信”》，第42—43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9页。

③ 《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第273页。

④ 参李学勤《谈“张掖都尉桀信”》，第43页。

⑤ [晋]崔豹《古今注》上《舆服第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⑥ 见李学勤《谈“张掖都尉桀信”》，第43页。

⑦ 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9）《秦汉简牍帛书》，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该文指出，“张掖都尉桀信”出土时已成团状，绢面破损，故某些字的笔划扭曲蜿蜒。

⑧ [日]西林昭一、陈松长《新中国出土书迹》，第139—140页。

附记：本文的初稿曾提交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及文化系主办的“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会议（香港，2010年5月）。写作中，承蒙张光裕、邢义田、吴丽娱、陈勇、侯旭东等先生提供宝贵的意见，谨此志谢。

（作者马怡（女），195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0年5月18日

## 敬告作者

本刊从2000年开始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敬请学界同仁垂注：凡为本刊赐稿的作用，请勿在文章中标署姓名。作者简况（包括作者姓名、发表时用名、性别、出生年、工作单位、职称、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E-mail等）请另纸附上。

《中国史研究》编辑部